

ZHONGGUO BAILUJING SHIYUAN

李加国 著

朱熹和白鹿洞书院

湖北教育出版社

朱熹和白鹿洞书院

湖北教育出版社

朱熹和白鹿洞书院
李邦国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129 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800

ISBN 7—5351—0411—8/B·5

定 价：2.25元

序

邵 达 成

本书把朱熹和白鹿洞书院联系在一起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朱熹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又是我国古代罕见的重视实践、热心讲学，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大教育家。

书院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的一种形式，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明珠，而白鹿洞书院则是这明珠中的最璀璨者。直到现在，它仍然以幽美的胜迹，驰名中外，为游览的胜地。

朱熹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订立学规，并亲自讲学，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起过重要的作用，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经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教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朱熹和白鹿洞书院的教育遗产加以研究，给它们在中国教育史上“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批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有用的精华，以便“古为今用”，无疑对于我们今

天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为“四化”建设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是有帮助的。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忠于儒家的传统学说，并加以改造和发展，创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以此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尽管朱熹在世时，他和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理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却越来越显示出对巩固封建秩序的重要作用，愈加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所以，南宋以后，直到清代，朱熹的《四书集注》，始终是钦定的学校教科书和国家开科取士的标准答案；朱熹的牌位也被供进了孔庙，成为从祀者，甚至与孔子并列，象神一样，受人顶礼膜拜。

朱熹是封建社会里有远见的人物。他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某些方面对当权者进行过批评，提出和试行过一些政治上的改革；他处处不忘设学施教，用封建礼教去“化民成俗”。他兴复的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古代书院和官学的范本。几百年来，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无一不是在按朱熹的教育思想施教，为地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

朱熹和白鹿洞书院的封建糟粕，我们当然要批判、抛弃。但朱熹和白鹿洞书院的可取的教学方法，如穷理与践履相结合，循序渐进和熟读精思相结合，重视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和师生切磋，以及读书自学的方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学工作的客观规律，是宝贵的遗产。

对于朱熹这样一个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关键性的人物，现在学术界研究的不少；但主要偏重于他的哲学思想。对于他的教育思想，还缺乏专题性的研究。对于书院这种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有过重要地位的教

育机构，现在也有人着手研究了，但对于各个书院的专题研究，除岳麓书院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办了专门的内部刊物之外，其它的书院尚未见诸专题的论著。

李邦国同志在教学工作之余，研究朱熹和白鹿洞书院的有关文献资料，并到白鹿、岳麓、石鼓、嵩阳和睢阳等古代著名书院作了实地调查，写出了《朱熹和白鹿洞书院》一书。作者试图对朱熹的生平、哲学和教育思想，作出简明扼要的评述，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历史沿革作出较详细的介绍，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由于作者不仅研究过有关书面资料，还深入实地进行了考察，不仅考察了白鹿洞书院，还考察了其它主要书院，使得作者在研究白鹿洞书院时，就能够互相参照比较，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论断。其次，作者把朱熹的教育思想和他在白鹿洞书院的教育实践融为一体，更加具体地阐明了朱熹的教育思想，也更为清楚地反映了白鹿洞书院的教育实际。同时，本书还附录了朱志经同志介绍中国古代书院概况的文章，使读者能够对中国古代书院的产生、发展、兴衰演变，及其经验教训有个全面概略的了解。

由于作者还是初步的尝试，书中的不足之处一定是有的。但无论如何，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一般教育工作者学习和研究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教育遗产，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一般同志，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了解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于黄若师院

目 录

序.....	邵达成 (2)
一、朱熹的生平简介.....	(1)
二、朱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哲学基础.....	(17)
(一)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17)	(二)朱熹的宇宙观(23)
(三)朱熹的人性论(34)	(四)朱熹的认识论(42)
三、朱熹的教育思想.....	(53)
(一)“明人伦”的教育目的(53)	(二)“小学”和“大学”的分期(59)
(三)关于德育的思想(67)	(四)关于教学的思想(72)
四、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振兴.....	(92)
五、白鹿洞书院的管理制度.....	(110)
(一)组织机构(110)	(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115)
(三)学规(120)	(四)礼节仪式(126)
(五)图书资料(132)	(六)洞产管理(133)
(七)经费收支(134)	(八)可贵的启示(139)
六、白鹿洞书院年表.....	(148)
附录：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明珠——书院.....	朱志经(166)
后记.....	(187)

一、朱熹的生平简介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字元晦，亦字仲晦，号晦庵，又号趣翁，别号紫阳。先世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的尤溪县（今福建尤溪县）。

朱熹生活的时代，是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朱熹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一生。他从十八岁考取进士，到七十一岁死去，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四朝，一生中前后作外官五任和宁宗皇帝的侍讲四十六天，总共为官不过九年，而私人讲学则长达四十多年，即使为官期间，也不忘开设学校，改良风俗，使一般民众既得到他的政治实惠，又受到他的礼义教化。他是孔子之后注重实践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也是孔子之后支配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思想长达七百多年而不衰的著名思想家。

我国从宋代开始，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发生了变革，门阀地主势力的社会基础遭到破坏，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封建制度的中央集权，也进一步加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惨重。正如朱熹所说：“古者剥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语类》卷110。以下简称《语类》）。因此，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仅朱熹生活的时期

内，大小农民起义就多达几十次，他们把反对贵贱等级、贫富不均和民族压迫结合起来。与此同时，金贵族统治者兴兵占领中原，宋室南迁，宋金民族矛盾变得十分激烈；而投降派官员秦桧得势，抗战派将领张浚、岳飞和韩世忠等被剥夺了兵权，岳飞惨遭杀害，朝野无不愤慨。

面对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宋王朝统治者不整顿吏治，甘当金贵族的“侄皇帝”，苟安江南，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则根据自己不同阶层、集团的利益，对社会矛盾的不同认识，以及各自的不同学习教养，冥思苦索，找到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朱熹肩负着地主阶级的这一重任登上了历史舞台，把理学系统化了。朱熹出身于一个衰落了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祖上历代当官，是婺源的“著姓”。他的父亲朱松，因为不肯附和秦桧的主和政策，被遣到福建充当尤溪县尉，以后去官教书，家境清贫，但行谊为学者所师。朱松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对少年朱熹都有深刻的影响。朱熹五岁读《孝经》，十四岁丧父，遵从父嘱，随胡原仲、刘致中和刘彦冲习“程学”，除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之外，他“无所不学，释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而于佛学，尤其潜心研究，能“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语类》卷104）

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年），朱熹十八岁，参加了“乡贡”，考官蔡兹认为他的“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朱子年谱》卷1上，以下简称《年谱》），将他录取。次年，被勒赐同进士出身，二十二岁时，宋王朝任命他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和教育等事务。等到二十四岁到职，至二十七岁任满。在其任职前后，曾随程颐的四传弟

子。六十六岁的老学者李侗习“程学”。而正式受业李侗，则是绍兴三十年（一一六〇年）以后的事了。后来，他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他遵从李侗的教导，只看“圣贤言语”，懂得了“理一分殊”的学说，思想“长进”了。他在同安县任职期间，为宋王朝向农民催逼赋税，不遗余力，遇到有人“违限遭点，定断不想，所以人怕”（《语类》卷106）。同时，他在镇压饥民起义的事件中，更是自觉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亲自指挥射杀饥民，并把城角的一块“隙地”辟为射圃，训练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武装。他在《射圃记》中追述：他当时“登城四望，慷慨相语曰：‘是不能守，吾属死无处所，不可不勉’。……其后盗虽已溃去，圃因不废，间往射如初”。

（《朱文公文集》卷77，以下简称《文集》）

除此之外，他还“兼职工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月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谱》卷1上）。他把县学分为“志道”、“据德”、“依仁”和“游艺”四斋，各置斋长一人。采用感化主义的教育原则，不注重机械的条规，采用问答式的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儒家传统的修己治人之道。

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年）底，右相陈伯康和主战派将领虞允文等，击败了金贵族的进犯，收复失地十多个州，很多人要求乘胜北上，收复中原。朱熹也十分兴奋，写了《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等许多诗篇，希望“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文集》卷2）；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到，朝内意见分歧很大，国力又弱，因此，主张只有“益修政理”，“还返旧京之事，乃可言也”。（《文集》与《藏板》）

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孝宗即位，起用主战派将

顿张浚，诏令朝廷内外陈述政见。三十三岁的朱熹很关心国家大事，他的学术思想和对战和之争的态度，也有很大变化。他与老师李侗一样，认为“国家所以不成事功者，正挫以和议为名尔。整顿纪纲，断以大义，使天下知所向背，此今日要务也”（《朱子遇市》、《延平答问补录》）。于是上《封事》极力主张首先改革朝政，停止与金人议和。他说：“夫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并建议孝宗皇帝：

第一，要熟讲“帝王之学”。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起，起用儒家学者“以备顾问”。如此，才能治国、平天下。

第二，要“修政事，攘夷狄”，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金。认为讲和“有百害无一利，……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责任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

第三，要整顿“本原之地”。他主张“正朝廷”、“立纪纲”、“厉风俗”和“选守令”；对于那些“病民”的官吏应予斥去。（《文集·壬午应诏封事》）

朱熹在给学讲课时，一方面批评了那些空谈“恢复”的人，同时也嘲笑了那些一味议和的投降派。指出“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战而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贵，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语类》卷133）。他认为，只有按他的主张，熟讲“帝王之学”，停止议和，内修政务，等到“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年谱》卷1上）

在这里，朱熹表现出了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胸怀。因为，南宋朝廷腐败，财政枯竭，政治混乱，军无斗志，如果

盲目用兵，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只有首先整顿内部，才谈得上一致对敌，并取得胜利。

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宋军战败，主和派汤思退遣使与金议和，抗战派群起反对。朱熹被孝宗皇帝诏见，面奏三札，再次强调《大学》“格物致知”之道，批评遣使求和是失策，主张“合战守之计为一”，认为胜敌治国在于纳贤杜佞。他说：“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年谱》卷1上）。孝宗开始听得很高兴，听到后来，就不理他了。最后让他当了个“武学博士”，待有空缺时再上任，去教学生习兵马武艺。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年），他上任后，同当权派洪适、钱瑞礼等人的主和之论不合，十分感叹主和之见所以得逞，是由于皇帝的“心术”受到蒙蔽，于是“请祠”回家。但是，却不忘“稽君心之非”（《文集·与陈侍郎书》），并看到人心的向背，相信“求和”的人不会比“六军万姓之为多耶！”（《文集·戊午浚议序》）。

以上朱熹反对议和斗争的几个回合，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岁月。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赏识，挤不进官僚的行列，此后居家二十多年，设“寒泉精舍”，从事理学的研究和讲学活动，极力在社会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夏天，吕祖谦在朱熹的“寒泉精舍”留住十多天，共同研究了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著作，商讨编写《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的教科书。当朱熹送吕祖谦回浙江，途经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内）时，由吕祖谦发起，邀请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在鹅湖寺开了一次理学问题的讨论会，实际上是一次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大辩论。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他们的争论，并非根本上势不两立，而是为了讨论更有效地加强思想统治，加速培养统治人才，和更好地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以保持偏安一隅的南宋小天下。因为，面对南宋岌岌可危的局面，统治集团内部思想混乱，迫切要求解决加强封建思想统治的问题。朱熹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主张培养人才，不仅要灌输封建思想意识，还得培养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他认为，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就得“道学问”，从“格物”开始，“即物穷理”，以学到为地主阶级效劳的本领。陆九渊从解决燃眉之急着想，认为治国、平天下，只要靠忠于地主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指挥行动就行了。他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只要做一番“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即端正地主阶级的立场就够了，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陆象山全集》卷34）。争论的结果，不欢而散，吕祖谦为了调和他们分歧的目的并未达到，反而更明确了他们的分歧。此后，人们就称朱学为“理学”学派，陆学为“心学”学派。

朱熹通过选编《二程遗书》，阐发二程“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核心，以维护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为宗旨，继承、综合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等人的学说，又吸取了释、道的唯心主义与诡辩术，在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年）编成了《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周易本义》和《诗集传》等书。其中《论》《孟》集注的编成，正式形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闽学”。其目的在于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为，在隆兴二年（一一六四年），“隆

兴和议”之后，宋金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南宋国内阶级矛盾则显得非常突出，朱熹的主战锐气也随之减弱。他说“闻汀寇甚炽”（《文集·与林择之书》），“近年茶寇形势”，“湖广之寇，正亦类如”（《文集·与皇甫帅书》）。这时，他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归结为有无农民起义。他指出：“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在于饥饿”（《文集·上宰相书》）。因此，他一方面赈济饥民，设“社仓”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粮食困难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宣扬唯心主义理学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说教，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这个学派中，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平时穿着近似古代服装的奇装异服，走路迈着方步，故意弄得阴阳怪气。他们在客观上与朝廷内的妥协势力相呼应，汇合成一股保守的政治力量。

朱熹几次得到妥协派骨干人物龚茂良等人的推荐，因主战派人士反对而未被重用。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由学吏浩的推荐，朱熹被任命“知南康军”。次年三月到职，翌即出示《榜文》，规定：第一，凡本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知道本地区“利病根源”的，“悉具以陈”；第二，请出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要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以便为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见《文集·知南康榜文》）

朱熹在南康军任职不到三年，不仅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而且还积极办学，以宣扬“理学”。为了扩大影响，他在学宫内设周濂溪祠，配祀程颐、程颢，让人们敬仰这些理

学大师。他除了在军学讲课之外，还重修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订立学规。对于教育目的，学习程序，以及修己治人之道，都规定得颇为详细。他定期到书院与学生“置疑问难”，“诲诱不倦”，又常请社会名流到洞讲学，一新师生耳目。他在书院内立陶靖节和周濂溪祠各一所，分别供祀周濂溪、二程、陶靖节和刘西涧父子，使学生仰见古代贤人风貌，能起到随时感化的效果。从此，南康教化大行，白鹿洞书院也成了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首，其《学规》成了各书院订立《学规》的范本，朱熹的名声也就更大了。当然，这个《学规》不外乎是孔孟以来儒家礼法的总结，纯粹是为地主阶级培养忠臣孝子设计的蓝图。朱熹按照他的理学宗旨，培养了一批门徒，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淳熙七年（一一八〇年），天下大旱，皇帝诏令各地官员体恤民间利病，朱熹又上《封事》，大讲“正心求，立纪纲”，影射孝宗皇帝起用主战派官员，是“偏党反侧之私”，攻击朝中主战派官员是“皆失其职”的“小人”，“上则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文集·虞子应诏封事》）。孝宗大怒，要右相赵雄批驳。赵雄劝孝宗皇帝，对待朱熹这类好名的人，只可“因其长而用之”。等他知南康军任满，就派他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其教荒有功，调任直秘阁。当时正遇浙东大饥，根据宰相王淮的建议，改派他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实际上是不让他到朝中做官，以免他替妥协派时时出谋划策。

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年），朱熹出任浙东之后，看出行将民变蜂起的危机，多次上书皇帝，请求惩办贪官污吏，减轻人民负担，以便“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年谱》卷3上）。

同时，他对妥协派仍持否定态度，指出“故相秦桧，归自金廷，久专国柄”，充当敌人内奸，“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居心“何止误国”！保留其祠与像，不足以教化民众，请予毁弃（见《年谱》卷3上，并见《文集·除秦桧祠移文》）。体现出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深谋远虑。可惜，在朝中政敌的扣压下，朱熹多次上书，并未送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吏部尚书郑丙还上书说朱熹之流“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史陈贾又面奏朱熹“假名以济其伪”，应“槟弃勿用”。孝宗皇帝采纳了这些意见，朱熹由此罢了官。淳熙十年（一一八三年），朱熹被派遣主管台州崇道观。同年四月，他结庐武夷之五曲，称“武夷精舍”，继续在民间讲学，“自是海内学者，尊信益众”（《年谱》卷3上）。其实，他这时是把主要精力用去还击浙东功利学派的批评，以巩固其理学的社会地位。

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参知政事，推荐朱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入奏事，有人劝他不要再发“正心诚意”的高论，他说：“吾平生所学，只此四字，岂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年谱》卷3下）次年，王淮罢相，朱熹又对皇帝大讲“正心诚意”，“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但再也不谈抗战恢复的事了。

朱熹从孝宗初年极力主张反和，到现在“置而不论”，历史上有过不同的评论。杨复说，这是因为朱熹看到当时朝政不振，国力贫弱，必先务本，并没有忘掉复仇的念头。由于“事不可幸成，政必先于自治，能如是，则复中原、灭仇虏之规模，已在其中矣”（《年谱》卷3下）。而李贽则认为，当举国上下激哀、痛恨、纷纷要求恢复和报仇之时，朱熹却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与屈辱，空谈“正心诚意”，没有贡献一点

“嘉谋嘉猷”，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还会消解人民抗金的意志，“何贵于正心诚意为也！”（《藏书·儒臣传·赵汝愚》）李贽的评论是有道理的。朱熹的万言封事，大讲“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说教和措施，听起来也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是围绕一个中心，即为理学一派争官夺权，客观上是对妥协投降派极为有利的。

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六十多岁的朱熹，赶忙在三月写出《序大学章句》和《序中庸章句》，企图用这两个课本，培养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才。由于朝中仍然政争激烈，朱熹还是不能挤进朝内。绍熙元年（一一九〇年），他被派知漳州。到任后，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和防止饥民起义，他奏请在漳、泉、汀三州“正经界”、“均徭税”，遭到豪族地主的反对，未能实行，只好辞官。他在漳州，同样十分重视教育，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还重视社会教育。他训练生徒，与南康相同。对学行均优者，特别奖励；对办事认真的职事人员，特别提拔。另外，该地风俗鄙陋，不知婚丧礼仪，朱熹就以改革风俗为主要内容，进行社会教育。他根据传统礼法，制订教条，教导乡民；还杜绝乡民崇信佛、道，不久风俗大变。陈北溪说：“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在在皆为之屏息；平时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抄掠于闾巷者，亦皆相视敛戢，不敢辄举；良家女子从空门者，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陈北溪集·郡斋录后序》）。在此期间，朱熹首次在漳州刊刻《书》、《周易本义》、《诗集传》、《春秋》、《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等“五经”、“四书”，以更系统地宣扬儒家思想和理学思